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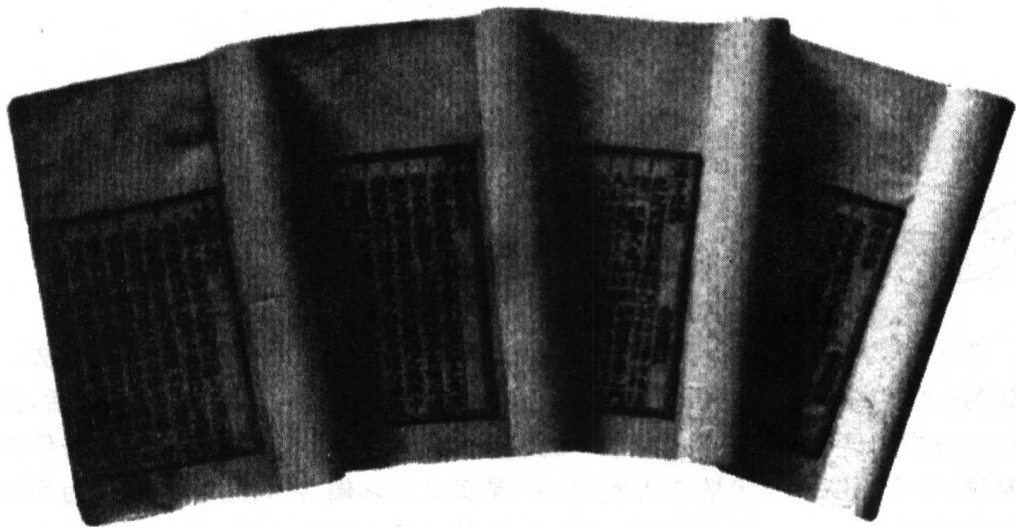
《四书五经》	1
《庄 子》	49
《孙子兵法》	57
《韩非子》	62
《墨 子》	67
《吕氏春秋》	71
《楚 辞》	75
《史 记》	82
《世说新语》	94
《文心雕龙》	97
《颜氏家训》	103
《乐府诗集》	111
《昭明文选》	115
《李太白全集》	120
《杜工部集》	126
《白氏长庆集》	132
《昌黎先生全集》	147
《资治通鉴》	140
《苏轼选集》	144
《漱玉词》	150
《稼轩词》	154
《西厢记》	158
《窦娥冤》	164
《水浒传》	171
《三国演义》	180
《西游记》	193
《金瓶梅》	208



《三 言》	218
《牡丹亭》	227
《红楼梦》	235
《聊斋志异》	247
《儒林外史》	256
《官场现形记》	265
《桃花扇》	270
《古文观止》	276
《三字经》《百家姓》	283
《千字文》	290
《曾国藩家书》	295
《女神》	299
《徐志摩诗全集》	305
《家》	311
《雷 雨》	318
《子 夜》	326
《鲁迅全集》	333
《骆驼祥子》	342
《围 城》	349
《沙家浜》	356
《毛泽东诗词》	361
《艾青诗选》	366
《金庸全集》	371



《四书五经》



《四书》书影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的合称，“五经”则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合称。

“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之时，这套“经书”大概就是这时编定的。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即公元 1190 年，理学大师朱熹为构筑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编辑在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行于世，遂有“四书”之名，“四书”问世之后，就和“五经”并列起来，被通称为“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儒家施行其儒学、儒术教化的重要教科书，也是统治者御民治国的主要精神武器，一千多年间是中国古代科举做官的必读书，它们在中国传统社会上层建筑领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对中国人的民族生存方式（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表情达意方式、生产劳动方式、休闲娱乐方式、繁衍生息方式）、民族心理素质、民族价值观念、民族审美观念等等，都产生了既广且深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大学》



作者：相传曾子

成书时间：约秦汉之际

类型：散文

作者介绍

关于《大学》(原是《礼记》的一篇)的作者和成文年代,历代有不同的看法。朱熹认为《大学》中的“经”是曾参记述孔子的话,“传”是曾参门人记述曾参的话,但无明确的证据。清代学者认为《大学》“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所以《大学》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不明。当代学者认为《大学》是秦汉之际儒者所作,也有人认为当是战国时期儒家作品。《大学》的成文年代,一般认为是在秦汉之际。

作品影响

四书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经程朱等理学家的改编、注释、阐发,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实践的圭臬,数百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和理想。《大学》位列四书之首,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二程、朱熹尊崇《大学》,使之与《论语》并列,并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其意在于说明它是由孔子经孔子门徒曾参这一中断已久的儒学道统的继承、发扬者。朱熹注释、改编《大学》,主要是凭借自己是儒学道统继承者这层关系,来宣扬他自己的理学思想,因此在《大学章句》中加入了不少理学特有的概念和思想,对《大学》原意作出了自己的理解,最典型的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杜撰了他认为原文缺佚的《格物传》一章,硬塞到《大学》中去。因此,在阅读时必须加以注意。

同时,二程、朱熹通过对先秦儒学的深入研究,阐发自己的观念,从学理上说,



也有其合理的一面,由于朱熹的注释、改编《大学》,没有斤斤于字义、名物、制度的考证,而是着力于从整体上探索与把握其思想体系,因此他对古代儒家思想的理解较之后世考据学家要更深入、全面。

朱熹用其后半生的时间,花费大量心血,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他自己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朱子语类》卷一四)。就在他临死前一天,他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的注。朱熹这种“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的治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六艺受到表彰,《五经》立于学官,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经书”。但是《诗》、《书》、《礼》、《易》、《春秋》各有侧重,于统治思想来看,则是缺少一种纲领性的东西。因此,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加以改造,使尘封数百年的思想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朱熹尊崇《大学》,为统治思想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的东西,他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朱子语类》卷一四)。这一纲领的确立,使《大学》位居四书之首,四书与五经并列则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大学》中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注意: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意在说明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兴衰。这种强调道德修养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作用,无论何时来看,都有其积极意义。其“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对今天我们为学做人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强调修身的同时,还提倡“诚其意,毋自欺”,“君子必慎其独”,讲究有道德修养的人在别人不注意时,也要恪守道德规范,行为一丝不苟。

关于“格物致知论”,虽是朱熹补传加入《大学》中的,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朱熹论述的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与途径,则是合理的和有参考价值的。朱熹的认



识论分两个层次,首先是“格物穷理”,然后才是“致知”,推知心中固有的知识,从而达到无所不知。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则是儒家关于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中国古代财政经济思想的宝贵遗产。同时《大学》反对统治者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聚敛财货,提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敬,财散则民聚”,“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义利的关系,具有进步意义。

《大学》中具有许多这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但是由于二程、朱熹尊崇《大学》是为了宣扬其理学思想,因此在其改编、注释《大学》时,使理学的观念渗透其中,如强调理,使格物致知成为学习天理的方法;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而忽视了对社会存在对思想意识的决定作用;对个人道德修养,只重视内心自省,缺乏其存在与实践的基础,这些都是读者在阅读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大学》的思想由于统治者的尊崇而成为统治思想,其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虽然《大学》经历了由不被重视,到奉为至尊,再到受批判,这样一个起伏的过程。历代对它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应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它所反映的个人道德修养的理想目标,和实践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则更应是我们现代人认真反思和借鉴的。



《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主要讲的是为政在人之道,是一篇如何平治天下的政治论文。书中所论述的治学之道,并不仅指获取知识的途径,更主要的是在阐发做人的方法、原则和目的,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修养。《大学》开篇便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条纲领,实际上是指人的道德修养的三个层次。“明明德”就是要弘扬、彰显人的本性中的良知良能,达到自我完善;“亲民”就是说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济天下人,使他人都能彰显其本性中的良知良能;“止于至善”是人的修养的终极目标,是前两条的总和,不仅要使天下人的良知良能得到彰显,而且还要让天下人感受到你的德行的恩泽,这样才算“止于至善”,天下也就太平了。

要实现这三个修养目标,就必须按照书中提出的八个条目来循序渐进地实行。八个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指的是人们认识事物,获取知识的根本方法;“诚意正心”是讲人修养的原则,要讲“慎独”,就是在无人监督的条件下,也要诚心诚意地恪守道德规



范；“修身”则是指做人、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与途径，是儒家“内圣”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结果与目的，儒家的“外王”的功夫。

三个纲领八个条目共 26 个字，道出了《大学》的精髓，书中的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一核心主旨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详尽的论述。在“经”第十章的最后，作者强调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意在于阐明国家的治乱兴衰，完全取决于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

《大学》成文到现在已 2000 多年了，《四书集注》刊行到现在也有 900 多年了。虽然书中有夸大道德作用的成份，但是在做人的原则、目的方面，古今是有相通之处的。读《大学》，不仅要弄懂古人做人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现在如何做人。

经典篇章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僨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罔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经典名句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中庸》



作者:相传战国子思

成书时间:约战国时期

类型:散文

作者介绍

关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的作者,司马迁、郑玄都称《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但清人崔则断言“《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冯友兰则从《中庸》的内容和文体两点出发,认为《中庸》的中间部分多言人事,似为子思所作《中庸》的原貌;而首末两部分则论及天人关系,文为论著体,乃后人所加。

《中庸》的成文时代,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孔子之孙子思所著,因有些内容为后人所加,所以其成文至迟也应在《礼记》成书之前。但就主要内容而言,似应将其成文年代定在战国时期。应该说《中庸》从子思之文到收入《礼记》,再到宋人的解说,最终由朱熹从《礼记》中抽出,重新校定章句,并加以注解,成为四书之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作品影响

孔子最先提出了“中庸”这个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就是将中庸奉为最高的道德。儒家讲究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到中庸,达到这一境界,便是天地各得其所,万物化育。可见中庸的重要。

如果说《大学》为人们勾画了自我完善发展之路的话,那么《中庸》就是一个行路指南。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士农夫,无论要“治国平天下”,还是要“格物致知”独善其身,都面临着在这个社会群体中生存、发展的问题。常有人说:做人难。《中庸》所阐发的中庸之道,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如能很好地领会《中庸》中



的主旨，那会让人受益无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的作用不下于《大学》，它的影响是直入人心的，因而它的影响也是最广泛、最深入的。朱熹《四书集注》刊行后，深得统治者的垂青，将其与五经并列，成为士人的必读书，其影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数百年来，被奉为人处事的圭臬。朱熹的思想也随《四书集注》的传播而风行天下，成为官方哲学，取得了至尊地位。

但是，物极必反。随着程朱理学在政治思想上至尊地位的确立，朱熹所强调的中庸便失去了其意义。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政治上要讲究统一思想，而这一思想给人们提出的要求却是“中庸”，为解开这一怪圈，于是便只强调庸，意即万古不变，这正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于是“中庸”由行路指南变成了一种管理人们思想的工具。

《中庸》里还有一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则是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则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直接影响。而其中的鬼神之说，则对宋明理学产生重要影响。“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则提出了一种道德修养方式——慎独，意思是在无人监督闲居独处时，自己的言行更应该谨慎，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朱熹从理学的观点对此进行发挥，认为在对待只有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小事上，要谨慎不苟，这样才能“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遇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在朱熹的眼中，“慎独”变成了“存天理，遏人欲”的方法。

《中庸》一书不长，但阐发儒家思想的地方却很多，道理精辟而且文笔简练文辞优美。

《中庸》所阐发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深远。虽然其中有讲鬼神和唯心之处，但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庸》的思想具有辩证的理念，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中庸》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是应给予高度评价的。《中庸》所提倡的道德准则和处世规范，对今天来说，也不失其借鉴意义。

内容精要

《中庸》全书共 33 章，3545 字，此外还有朱熹所加的注释和解说，以阐发其思想。

《中庸》第一章开宗明义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意在说明道的本原出于天，是不变的，人禀赋此



道就叫做性。因而道存在于人的本身之中，片刻也不能离开，能离开的东西就不叫道。接着便是阐述“存养省察”功夫的大要，认为人若要得道，就必须注意自己的品德，一刻也不能疏忽，即使没人注意，也要保持自己的品德，这叫做“慎独”。最后说明“圣神功化”的最高境界，指出人若能达到道（也就是文中所谓“中和”）的境界，则天地各得其所，万物化育。

经典篇章

朱熹认为第一章是《中庸》一书的纲领，指出要做到上述内容，就必须返身自省，去私欲，实本性。以下十章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话，来说明这一章的主旨。

第三十三章则是对《中庸》一书的主旨加以总结说明。

中庸一词，语出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乎矣！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不偏不倚；“庸”，平常不易。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说：“庸是常然之理，万古万世不可变易底，中只是个恰好道理。”

经典名句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论语》



作者：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

成书时间：约战国初

类型：语录体散文

作者介绍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孔子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但他在早年还是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对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十分熟悉。孔子天资聪颖,又极为谦虚好学,故而学识日进。到 30 岁左右,已经以博学知名于世,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他一方面对以前的文化、思想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同时也结合春秋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对一系列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从而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早年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担任管理仓储、牛羊的小官,都能恪尽职守。因鲁国内乱,一度旅居齐国。后仍回鲁国收徒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年过 50 以后,一度被鲁国国君委以官职,做到司寇,主管鲁国的司法工作。他希望加强国君权威,削弱卿大夫权力,与当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产生矛盾,最终被迫弃官离开鲁国。这段做官的时间,大约不超出 5 年。此后,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各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并曾在卫国、陈国停留了较长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也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般只是被供



孔子



养起来装点门面,还有很多时候备受冷遇和迫害。在这段时间里,孔子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与弟子们反复探讨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论。在公元前484年,经过大约14年的流浪生涯之后,孔子终于重返鲁国,将余生的精力贯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教材定本。晚年的孔子在鲁国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仍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生活上也迭遭不幸,独子孔鲤和两个重要弟子颜渊、子路都先他而死。公元前479年,孔子病逝于家中。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词,弟子们为孔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守孝三年。

作品影响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论语》一书,篇幅虽不长,但却是了解、研究中国文化不可不读的作品。宋人赵普(太祖宰相)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它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论语》不仅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而且很早就流传到海外,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诚可谓东方的“圣经”。

谈到《论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是与孔子的名字分不开的。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屡屡碰壁,得意时少,失意时多,但毕竟以道德高尚、人品出众、学问渊博知名于世,受到时人称颂。当时人说他是上天用来启发下民的“木铎”、多能的“圣者”。他的学生颜渊说认为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赞美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战国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世之“显学”,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都对孔子备加颂扬。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被推戴到先秦诸子之上。大史学家司马迁专门在《史记》中为孔子立“世家”,将他抬到诸侯的地位,称颂他是“至圣”。还有的儒者称孔子是“素王”,即指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此后直到清代,儒学基本上一直都处于独尊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竭力尊崇孔子,为他建庙祭祀,赐给他的后裔封爵和特权,并给孔子本人加上“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多种华贵头衔。孔子的名字,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虽然历代的儒学经过某种改造,与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有了一些差异,但像孔子思想中强调德治、重视教化、轻鬼神重人事、积极进取等内容一直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仍长期在历史上发挥着作用和影响。

孔子虽然博学多识,但却“述而不作”,除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外,自己



并没有写出系统阐述思想的论著。而《论语》作为弟子和后学整理的材料,却在这方面起到了弥补的作用。《论语》的内容,涉及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还记载了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和生活习惯。可以说,《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生平最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也就是《论语》后来能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西汉时,立《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书于学官,称为“五经”,它们都是经过孔子删订、整理的古代文献。《论语》在此时尚未取得与上述“五经”并驾齐驱的地位。根据零散材料来看,西汉人往往把《论语》等同于《孟子》、《墨子》等,作为诸子的一种,同时也把它看作辅翼经书的“传”和“记”。但到东汉,随着儒学地位的继续上升,《论语》已开始进入经书行列,与《孝经》一同被加到“五经”之上,称为“七经”。《论语》、《孝



孔子杏坛讲学图

经》两部书,篇幅较短,相对于深奥的“五经”来说也更加浅显易懂。故而在汉代,学子们大致识字以后,便读《论语》、《孝经》,为以后学习“五经”打基础。“五经”难度大,一般人毕生只能通一经,能通两种以上的很少见。而《论语》则是读书人必读之书,无论是否通经、通几经,必先通《论语》。唐代以《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九经”,其中又根据经文字数的多少分为大、中、小三等。在“九经”以外,《论语》和《孝经》要求所有读书人都研读,被称为“兼经”。唐代学制当中规定:大经和中经为分科必修,小经为选修科目,而《论语》、《孝经》则为共同必修科目。科举中有“明经”一科,无论主考何经,《论语》、《孝经》皆为共同必试。唐文宗开成年间,诏刻“十二经”,立石于国学。这“十二经”就是在“九经”以外,又正式加上了《论语》、《孝经》、《尔雅》三部书。宋代人又将《孟子》抬入经书行列,于是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十三经”。

在宋代,以程朱理学为主要代表的宋学兴起并盛行,将儒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宋学的特点,是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发挥,因此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比较集中的《论语》、《孟子》等几部书,尤其受到宋代学者重视,地位开始超出内容繁



琐难懂的旧“五经”。著名理学家程颐即非常推崇《论语》。他评价《论语》“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到南宋，理学家朱熹从《礼记》中抽取《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四书集注》，其中《论语》列于“四书”首位。

元明清近 600 年间，“四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而《论语》作为“四书”之首，也自然成为士人们读书做官的一块敲门砖，可说是家读户诵。它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如此，《论语》的影响还越出国界，远及日本、欧洲等地，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论语》一书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究其原因，并不偶然。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思想家之一，当时人类文化的发展还相当幼稚，不够成熟。可以说，孔子是最早对生活中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回答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社会阅历丰富、思想方法得当，因此经他总结并回答的问题（大都存于《论语》书中），很多都是非常正确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德不孤，必有邻”，“三人行，必有我师”之类，都成为重要的格言箴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对人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前人称颂《论语》“和平通达之中，寓至精至粹之理”，并非过誉。同时，《论语》中所反映孔子的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思想，很多已逐渐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当中，成为中国人的美德，具有极大的继承价值。



《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门后学七十子的门人所记，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一致。

《论语》所记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悌、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这是符合后来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的。因此，过去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的思想来巩固其统治，而尊之为“圣人”。

孔子处于矛盾复杂的过渡时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例如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又如仲弓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冉求为季氏聚敛，他就严厉地谴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孔子是同情穷人的。公西赤使齐，冉求



为其母请粟，与之五秉。他说：“君于周急不继富。”原宪为宰，辞粟九百，他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以上《雍也》）孔子的有关教育、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至理名言，例如“有教无类”（《卫灵公》）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以上《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等。孔子生平最重诗教，曾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季氏》以后，章句较前稍长，文辞较前尤畅。但主要特点则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例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这显然不仅仅是对松柏的礼赞，而是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后世多少诗人所歌颂的“郁郁涧底松”和“松柏有本性”，都是从孔子这一深刻的观察中得到启示。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赐看见孔子有道不仕，便问道：“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这样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又如《阳货》篇有这样一章：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这段语录既诙谐又严肃。孔子平日的风趣，子游的笃信师说，他们为师弟子间的和平愉悦之情都宛然如见。

《论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进》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谦逊，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具体生动。而全书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如《八佾》篇“孰谓鄆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及“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等，又是本书另一特点。



学而（节选）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



己。”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为政(节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季氏(节选)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孔子不仕退修诗书图



经典名句

- △吾日三省吾身。
-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 △道不同，不相为谋。
- △小不忍，则乱大谋。
-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